

# 1992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

陆 建 华

本报告着重描述1992年社会公众的心态,并依据丰富的调查资料详细分析各阶层公众的独特期望、感受和观念倾向。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在社会变革进程加快的情况下社会形势与公众心态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报告的预测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立足于对社会形势的动态趋向的把握,使预测本身成为描述、分析的自然延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陆建华,男,196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公众心态是社会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客观社会形势的折射,也是社会形势中的一种独立变量。为了对1992年的公众心态进行分析并对未来一年的心态进行预测,“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下,于1992年5月进行了问卷调查。<sup>①</sup>该项调查及分析主要从下列三个方面展开。

## 一、1992年社会公众心态的总体状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直接起因,从3、4月份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起,改革加快步伐已成定势。社会公众的心态也随之发生极其明显的变化。

第一,社会公众对1992年改革的一般看法。

调查结果显示,截至5月,公众对改革的态度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求快,一个是求稳,两者相加占91.3%。其中认为“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应加快改革”者占42.1%,认为“稳一点好”者占49.2%,这说明,1992年的改革形势引起绝大部分公众的关注。

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时,<sup>②</sup>31.6%的人称“改革不配套、改革机制运行不力”,居第一位;23.6%的人称“物价上涨加快”,居第二位;其余依次为:“分配不公加剧”(16.7%)、“社会治安变差”(12.9%)、“政策多变、缺乏一贯性”(9.8%)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3.4%)。

那么,公众又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稳定问题呢?

在我们所列的实现与保持稳定的主要条件中,“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领导”获得48.5%

<sup>①</sup> 本调查抽取样本共20500份,回收问卷19856份,回收率86.8%,样本分布在全国6省18市的市区、镇和乡。被调查居民中,工人占21.5%,干部占28.7%,专业技术人员占19.3%,服务人员占6.1%,街道居民占9%,在校大学生占5.1%,农民占5.7%,个体经营者占4.4%。

<sup>②</sup> 允许选择两项。

的被调查者的确定,位列第一;位居其次的是“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地发展”,占35.7%第;三位是“稳定物价,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占34.9%。这一结果表明,公众对社会稳定的条件的认定,明显地倾向于对决策者的高期望。

第二,公众对1992年改革的具体期望。

公众对1992年哪项改革最为关心呢?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两项):第一位,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占37.6%;第二位,住房制度的改革,占31.3%;第三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占27.6%;第四位,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占26.6%;第五位,全民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占16%;第六位,价格改革,占15%;第七位,政企分开,占14%;第八位,实行股份制,占9%;第九位,税收、金融体制改革,占4.4%;第十位,流通体制改革,占2.9%。

以上所列10项改革,是1992年改革步伐加快以后全面、快速推进的改革内容。上述结果表明,公众并不是从一般角度来确定改革的孰重孰轻、孰前孰后,他们完全依据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关系密切之程度来调节自己的关心焦点。所列的前4项,涉及到公众的收入、消费、保障和职业流动;而相比起来,在个性才能发挥、职业流动等的事项改革,则收入是公众最关心的,这是现阶段公众的利益概念的最主要内涵。

公众对利益得失的警觉,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价格改革”的看法上。调查结果显示,75%的人认为价格改革“要分步到位,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占被调查者的3/4,有16.7%的人认为“应大胆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4.4%的人认为“放慢改革步伐,否则会引起物价猛涨”,另有1.3%的人认为“不要改革,维持原状”。1992年,物价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关系民生的一些重要商品的涨价已逐步展开,全局性的民心波动并未出现;然而公众的承受能力虽然在逐步提高,但还是有一定的阈限,四分之三的人确认要把“群众的承受能力”放在物价改革的首位,这似在提示我们,在加快改革步伐的情况下,物价改革应该快中有慎。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也是1992年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最初几个月里,形成从上到下,全民皆谈打破“三铁”的热烈局面。我们的调查表明,公众更多地是从自身的利益如何获得和确保的角度来肯定这一改革的。认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能“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人占83%,否定者占13%;认为“能提高工作积极性”者占82%,否定者占14%;认为“使收入变得不稳定”者占73%,否定者占22%,认为“使工作变得不稳定”者占69%,否定者占26%;认为“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者占66%,否定者占29%。

第三,公众对与改革近期目标相关的“小康问题”的基本看法。

本项调查表明,1992年,公众对目前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比较高,尽管他们抱怨自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太低”。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尚不得温饱”,43.9%的人认为自己“勉强度日,处于温饱水平”,43.1%的人认为自己“满足生活需要后略有结余”,8%的人则认为自己“生活宽裕”,10%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用品比较齐全,生活质量较高、有较多结余”。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公众自我认定,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其余为“温饱”和“贫困”。这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有很显著的提高,同时,迈向小康,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据此,我们调查了公众对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看法,结果如下:认为“能实现”者占62.6%,其中,“能提前实现”者占6.7%，“定能按期实现”者占12.2%，“可能实现”者占43.7%;另有16.3%的人认为“较难实现”,19.8%的人则“说不清”,这两者相加,超

过被调查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对还有近半数的人尚生活在小康水平线以下的必然反映。

在公众心目中，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依选择顺序排列如下（选两项）：人口太多，占56.2%；社会分配不公，占43.3%；城乡差距过大，占25.4%；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不良，占22.5%；思想观念跟不上改革的发展，占17.7%；贫困问题，占17.1%；消费结构不合理，占11.1%。

可见，除了“人口太多”这一难以消除的障碍之外，“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它与居其次的“城乡差距过大”问题，竟差17个百分点。生活水平与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已经在公众意识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们对“社会分配不公”现状的不满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生活水平实际上成为他们的自身利益得失的一项客观指标。

## 二、各主要社会阶层公众心态

### （一）职工<sup>①</sup>

对1992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职工要比其他社会阶层公众更加审慎些。职工对“改革的条件已具备，应加快改革”方面，持肯定态度的有35.7%到36.4%，明显地低于专业技术人员（46.5%）、干部（占45.5%）和农民（44.3%），也低于大学生（39.7%）、个体户（41.4%）和居民（41.5%），是所有阶层公众中态度最为保守的。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职工对1992年加快改革步伐持“无所谓”态度者的比率，仅有7.6%到8.4%，低于农民（10.4%）和个体户（8.5%），这表明，职工对加快改革步伐的审慎态度是出于一定考虑的，他们比较关注改革进程，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促使他们不愿意表现出过于乐观的看法。

这种原因是什么呢？在回答“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时，在职工心目中，排列在首位的，不是别的而是“物价上涨过快”，近三分之一的职工持这样的看法。

在主要社会阶层公众那里，有四部分人把“物价上涨过快”视为加快改革步伐最可能出现的问题，除了工人和服务人员（总称职工）之外，还有街道居民和个体经营者，这与他们对改革、对社会形势的关注焦点有关。物价问题实际上被职工们看成是切身利益在加快改革步伐情况下所得所失的第一标准，和“社会分配不公加剧”比起来，这也是一种可以切实具体地把握的标准。

调查发现，职工最关心的改革事项，依次是：工资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劳功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等。列在前几位的，无不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特别和农民、大学生、个体经营者比起来，职工更侧重把工资改革放在第一位。

调查还表明，绝大部分职工（80.4%的工人，85.3%的服务人员）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能否提高企业效益持肯定态度，但另有相当比例的职工对此犹疑，这应予以高度关注。

最显著的反比关系表现在下列方面：在涉及到象提高效益、提高积极性这样较抽象层面问题时，肯定者占绝大多数；但涉及到象收入、职业稳定性和人际关系等具体问题时，职工中持否定者占多数，分别有75.5%、75.3%、71%和69.9%、69.7%、69.6%的工人和服务人员，对“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和“人际关系紧张”，持肯定态度。其他阶层公

<sup>①</sup> 在本次调查中，指企业单位中的工人和服务单位的服务人员。

众的基本态度与此类似，只是未达如此严重程度。这说明，职工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意义的接受，并不能化消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审慎心理。

如此必然影响到职工对其他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比如，在回答“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时，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态度与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有较显著的差异。综合全体被调查者的选择次序依次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领导”，“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稳定物价、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唯独职工，把“稳定物价，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列在首位，且选择率在43—41%，这典型地反映了职工在1992年的心态特征。

## （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总体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1992年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持比较审慎的乐观态度的同时，我们发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偏离“平均值”最大，他们中有46%的人主张“应加快改革”，这一比例比农民(44.3%)高出近两个百分点，比工人和服务人员(36%)高出10个百分点，比之其他各阶层，呈现出更积极的态度。另一组数据表明，学历越高者，主张“加快改革”的人所占比例也越大：大学学历者，占49%，高中者占40%，初中和小学者占38%，无学历者占29%；以单位性质看，在党政机关工作者占50.9%，在企业工作者占38.4%，最高和最低两者之间相差12个百分点。

那么，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哪些改革最关心呢？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与职工的关心焦点一致，即他们最关心的是工资改革，视之为最关心者近50%；其次是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何以如此？在他们对“本单位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上有所反映，即也和职工一样，把“收入低”和“劳保福利太少”看成是最主要的问题，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看，这一部分公众的平均收入，确实低于其他阶层。在1992年改革加快，物价明显涨幅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更趋严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对价格改革持谨慎态度，是很自然的。他们中有80%左右的人认为这一改革要稳妥一些，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只有59%的农民和57%的个体户持这样的态度，后者的承受能力显然要强于前者，至少在物质实力基础方面来说是如此。

在对“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回答中，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独特心态又一次体现出来，他们与其他阶层公众的思维定势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职工、个体经营者最担心“物价上涨过快”，农民最担心“社会治安变差”，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最担心的则是“政策不配套”。被调查者中40.5%的干部和39.8%的专业技术人员把这一问题放在第一位，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比例是：大学生占37%，服务人员占26%，街道居民占25.3%，工人占22%，农民占17.7%，个体经营者占15.9%。在这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关注焦点首先是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本身的合理性，其次才是决策、措施可能有的不合理带来的危及自身利益的消极后果，如物价上涨过快等，他们对1992年改革与社会形势的前景认识，显然带有较系统的判断依据。

与“改革不配套”相关的“社会分配不公加剧”也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对不公的警觉程度，超过对“物价上涨过快”的警觉，而位居第二，有19.2%的干部和18%的专业技术人员持这样的态度，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是：工人占17%，服务人员占14.7%，街道居民占12.1%，农民占11.1%，个体经营者占11.6%。差异是很明显的。

总之，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对199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的态度呈审慎中的积极的特点。在关注涉及到自身经济利益的改革问题的同时，他们还极为关注改革本身的合理性。从他们对

社会发展前景的较乐观估计看,迫切希求改革能提高合理性、系统性、提高效率,少走弯路,少付代价。改革的深入发展,也是他们所企求的。

### (三) 农民

农民是过去十几年改革受益最多的阶层之一。1992年改革步伐的加快,在他们心目中引起的反应是审慎基础上的积极态度,认为“改革的条件已具备,应加快改革”者占44.3%,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一样,这一比率也超过了总体平均值(42.1%)。这一部分公众,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和巩固,已经经历了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观念到行为模式的巨大转变。在1992年以前,这一进程尚没有明显的停顿或倒退。到199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出现转折时,农民并不像城市公众那样受到较强的震撼。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比较低,且总体数据表明,学历越高者对“加快改革步伐”态度越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有超过40%的农民持“加快”观点,比率是相当高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和其他阶层公众一样,农民对事关切身利益改革投以最大的关心。在被列出的诸多改革项目中,农民最为关心的是两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价格改革。城市公众关注的工资问题在农村是不存在的,但作为社会分配的一种重要调节途径,社会保障对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极重大的意义;既有农工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关系模式,又有价格体制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施以重大影响,他们首先关注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的的事实是,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如生产体制)比起来,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相对缓慢,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头绪纷乱,困难重重。这种相对落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利益。价格改革影响农民利益的因素及其后果更加明显。在加快改革步伐的1992年,上述事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自然强化了农民对这些方面改革的关注。

我们发现,职工对在价格体制方面“大胆加快改革步伐”的肯定比例,只有15%,而农民则达到29%,几乎高出一倍。这与其说是农民比职工对价格改革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倒不如说他们更迫切地希求改革不合理的工农产品价格关系模式,少受“盘剥”,更快地提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也成为这一部分公众对“加快改革步伐”总体上持审慎基础上的积极态度的佐证。

对“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农民的看法,与其他阶层公众有较明显差异。调查结果表明了下列次序:第一位,“社会治安变差”(30.6%);第二位,“物价上涨过快”(21.1%);第三位,“政策不配套”(17.7%);第四位,“政策多变”(13.7%);第五位,“分配不公加剧”(11.1%)等。

这里,被农民视为头等问题的“社会治安变差”,在其他大多数阶层公众中仅居第四或第五位。近1/3的农民,持这样的看法,说明他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担忧是相当严重的。这和个体经营者(占19.4%,居第二位)、街道居民(占13.7%,居第三位)的反映相类似。这只能说明,农民的安全感是极其不牢固的。现阶段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以及治理方面的收效不高,使农民有充分理由把对现状的估计延伸到对前景的展望上。

我们还发现,其他阶层公众认为比较重要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农民则关注不多。只有11.1%的农民认为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是所有阶层公众中比率最低的。从文化程度的角度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随学历高低而变化,即学历越高者,越视之为“重要问题”,学历越低者,越关注甚少。农民的上述态度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原因。一般来说,他们对“社会分配”、“分配不公”的概念的理解不那么系统,或者,很少从分配公正角度来理解自身

的利益得失。另外，到1992年，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利益分化还只是刚刚开始，社会分配公正原则还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如权力、情亲），让人难以明辨。农民尚不能强化“分配公正”观念，也就不奇怪了。

调查还表明，1992年农民对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显示出显著的分化特征，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看法。将生活水平依“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富裕型”四类划分，“贫困型”中，农民占比例最高，占5.6%，超过个体户的4.4%、职工的3.2%和3.8%、干部的2%和专业技术人员的2.5%；但是，自认为生活水平达到“宽裕”和“富裕”农民的比例，却不但不是最低的，而且还高于职工、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街道居民，前者为16.4%，后者分别为8.5%、6.7%、5.6%、6.4%、和13.6%，高出的比例数值也是极可观的。这种分化状况，在1978年开始改革以后逐步开始形成，到1992年，已成为一种稳定的趋势。这也说明，农民对1992年加快改革步伐举措，不可能消极应付，同时，他们所关注的改革事项的进展，将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及其自我评价。

总之，农民对1992年改革步伐的加快持较积极的态度，他们极其关注社会保障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其基本动机是保证自己的切身利益。1992年，社会治安形势未有转折性好转，一些农村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使他们比其他阶层公众更缺乏安全感。另外，他们对“城乡差距过大”有较真切的体验和认识。

#### （四）高校在校学生

这一部分公众文化程度较高，但他们尚未占据一定的职业地位，也无收入来源，而学生身份使他们便于吸收较多较杂的思想、观念，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也较少束缚。对1992年加快改革步伐的转折，他们似采取偏向审慎的态度，主张“应加快改革步伐”者为39.7%，仅高于职工（36.4%和35.7%），位列倒数第二，低于干部（45.5%）、专业技术人员（46.5%）、街道居民（41.5%）、农民（44.3%）和个体经营者（41.4%）。

回答“对哪项改革最关心”问题时，学生的选择是：第一位，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第二位，工资制度改革。不消说，这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事项。

对事关民生的价格改革，在校学生主张“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他们不象农民、个体经营者那样积极主张“大胆加快改革步伐”。过去的经历表明，在校学生是以特殊方式来体验物价上涨过快所带来的痛苦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工薪收入阶层公众。看来，他们对1992年加快改革步伐可能会出现的涨价问题，依然抱有高度的警觉。

在对改革可能带来的问题的认识上，在校学生的看法与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看法基本一致。这里起作用的，显然是文化程度因素及其铸成的特定的思维定势。他们把“政策不配套”、“分配不公加剧”视为最为主要的问题，这也是对改革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和系统性的期望所致，也蕴含着对改革决策者的特定希求。从对改革前景的预期角度看，在校学生的这种认识，是一种较合理的认识。

同样不能忽视的现象是，在校学生中有7.5%的人预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可能会出现，比例本身不高，但和其他阶层公众相比，却是最高的，这或许最能反映在校学生在1992年的特殊心态。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校学生不可能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前景而“对加快改革步伐”采取不那么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可见，问题必定出在学生改革本身的进程、性质的认识上，这种认识又必定区别于其它阶层公众。再加上高校

分配体制改革对他们的强有力影响，在校学生对1992年的改革和社会形势的过分审慎态度，实际上蕴含着某种难辨的认识成份，也蕴含着某种情绪成份。这些，都是高校在校学生所独有的。

在对“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的认识方面，48.1%的在校学生认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各阶层公众中比例最高的，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独特看法，相比之下，“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领导”、“稳定物价”这类的条件得到其他阶层公众的更多的首肯。

总之，在校学生对199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持过分审慎的态度，有复杂的原因。他们较多地通过对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的合理性的评价来决定对改革的看法。对涉及到他们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予以头等关注，对物价问题也极其敏感。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时从两个层面来注视1992年改革形势的转折的，一是改革的社会合理性，一是自身利益的得失。

### （五）个体经营者

个体经营者阶层是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并不占多大比重，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及其变化，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我们的这次调查中，接受调查的个体经营者人数占总调查数的4.4%，共902人。

调查结果表明，主张“加快改革步伐”和主张“稳一点好”的个体经营者，共占86.7%（前者占41.4%，后者占45.3%）。

这一部分公众没有“单位依属”关系，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住房紧张”。其他阶层公众或者把“收入低”（职工、干部）、或者把“效率低下”（大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最主要的问题。

与此相关，个体经营者享受不到随单位依属而来的各种保障、福利的庇护，成为城市居民中置身于社会保障网之外的、为数不多的阶层之一。调查表明，社会保障体制已有的改革尝试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这方面的改革居个体经营者最关心项目的第二位，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又因为这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的“飘浮性”地位特征，1992年整个改革步伐的加快，必然引起他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特别关注。

在几乎所有其他阶层公众对“收入低”、对“工资制度改革”予以高度关注时，个体经营者则决无此忧。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无论从平均值还是从绝对数看，这一阶层公众的收入水平是所有阶层公众中最高的。他们对价格改革持一种较积极的态度，是在意料之中的。个体经营者主张在这方面“应大胆加快改革步伐”者占29%，高出职工14个百分点，相应地，主张“考虑群众承受能力”的个体经营者占57%，比干部和大学生低23个百分点。从总的比率分布看，个体经营者和其他阶层公众的态度相比，其积极心态体现了出来。这表明，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比其他阶层公众稍强。

对1992年改革步伐加快可能产生的问题，个体经营者视“物价上涨过快”为最，占31.2%，“治安状况变差”为次，占19.4%，第三才是“政策不配套”，占15.9%。这是注重改革的可能后果而不注重改革本身合理性的典型看法。这一点，他们与职工、农民、街道居民无甚差别。比较特殊的是，个体经营者对“社会治安变差”担忧极重，仅次于农民。从文化水平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之间的相关关系看，低文化水平者占多数的个体经营者无法摆脱像农民那样的思维定势，尽管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与农民大相径庭。

这一点，为下列问题的调查结果所证实。对“实现和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的看法，个体经营者的看法与农民、街道居民完全一致，即认定“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领导”为最，这三部分公众所占比率均在51—55%，这显著地区别于其他阶层公众。这里，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在预期加快改革步伐可能有的后果时，他们并不直接强调决策和领导的合理性，在预期实现稳定时则视之为头等条件。

另外，个体经营者对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比较有信心，64%的人认为“可能”。这与他们对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状况有关，在所有阶层中，自认为生活水平达到“宽裕”或“富裕”者，个体经营者占的比率最高，占26.6%，超过1/4，且比第二位的大学生（16.8%）高近10个百分点。这样，他们对实现小康的最大障碍的理解就止于一般化，如“人口太多”、“贫困问题”等。

总之，个体经营者对199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的看法以审慎为基调，他们迫切希求加快住房、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否则他们在这方面的利益得不到保证。这一部分公众的经济收入较高，对价格改革态度较积极，但对作为加快改革步伐可能带来的“物价上涨过快”也极为担忧，他们对社会治安状况也极敏感。

### 三、分析与预测

#### （一）从社会形势看公众心态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以及随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际上使改革和社会形势出现转折性变化。相对于前几年的状况，1992年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构成了这一年公众心态变化的客观基础。

仅从“转折性”这一点看，公众对加快改革步伐的举措，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这种转折的实现，总体上看是由上而下的，公众对此要表现出高度积极的态度，还需要一个过程。而本调查是在1992年5月做的，公众心态对上述转折的反应也尚处于开始阶段。尽管1992年的改革是过去十多年改革的自然延续，但是，公众的意识深层积郁起来的，不仅有被催生的改革意愿，也有因改革出现曲折而带来的犹疑和担忧。化解这种担忧，尚需时日。1992年的改革和社会形势开始了这一化解过程，这是昭然的事实。

1992年社会形势的转折性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加快改革步伐为轴心。在1993年，这一轴心可望继续起作用。据此，可以对公众心态的进一步变化作如下几点预测：

第一，随着改革的深入，公众心态将迅速向积极、乃至高度活跃的方向转化。在1993年，将有一大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这意味着旧的体制与此相关的观念、思维模式将进一步瓦解，相应地新观念、新思维模式会不断出现，这将有力地促成上述转化。在职业、消费、收入、人才流动、金钱、事业、合作、竞争、信息交流等许多方面，公众的行为方式将有极显著的变化。这也是积极心态构成的重要动因。

第二，从1992年社会形势看，以往积存下来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像社会治安问题、过速涨价问题、经济行为合理化问题、社会风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为政不廉问题等。在一定范围内，程度有所加重。这已经在公众心理上投下阴影。若这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有所缓解的话，公众心态将受到极大影响。

第三，1993年改革将进一步促使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得失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1992年各阶层公众的心态在许多方面有极大的差异，若忽视对上述关系的有效调节，则可能

使这种差异超速扩大，某些阶层公众的心态将陷入持续的动荡中（干部、在校学生、职工和多数退休者的街道居民）。

## （二）从公众心态看社会形势

1992年，公众对改革和社会形势的态度总体上是审慎的，在此基础上，有些阶层公众的态度较为积极，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高文化水平公众，如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低文化水平公众，如农民、个体户；还有一部分公众（主要是职工和在校学生）持偏向保守的态度，其原因也不一样。显然，1992年社会形势的转折本身也造成了上述局面。

我们认为，各阶层公众除了利益不同之外，还有思维定势方面的差异。任何改革要获得最广大的多数阶层的支持与参与，必须同时顾及这两方面。由于1992年改革和社会形势是以自上而下形式和“转折”形式出现的，固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突兀式的新鲜感，但却缺乏充分的社会动员过程和有效手段，至少未有全新的动员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众的心态由审慎到积极、活跃的转变。

1992年社会形势的另一个特征也能通过公众心态加以把握。在没有充分社会动员情况下，各种改革措施接连出台，实际上把公众直接推进到改革浪潮，这固然能加快他们的心态的积极转化，但却忽视各阶层公众在利益和思维定势方面的差异，且无有效调节措施实施，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态混乱。这构成了这一年社会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么，1993年，在继续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迅速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和调节手段，就能够化解公众的心态混乱，保持社会形势的健康势头。这种调节手段应该是改革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应该成为连接各项改革措施的一种重要“胶合剂”。

可以预见，在1993年，改革决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有效的实施过程（特别是调节手段的实施）不可能一下子展开，这意味着，社会形势在活跃和健康的基调上，会有局部的一定程度的迷乱现象出现，因为各阶层的利益的调整和期望的实现无法一下子完成。从1992年的公众心态推断1993年的社会形势如何，既取决于改革是否进一步深入，也取决于改革的深入是否和各阶层公众的利益关系的调节相同步。

责任编辑：张宛丽

## 书 讯

《社会指标的应用》是国家重点课题《社会指标》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专著。书中主要介绍了社会指标的理论方法及1991年各种综合性和专题性社会指标的应用实例。它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国际间、地区间的评估和排序。通过指标的量化，能从中找出各地的进步与差距，能监测社会经济协调度和揭示社会问题，具有开拓性和实用性，能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书中还介绍了警报指标体系、小康及社会保障指标体系及10篇最新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它是各级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和科学研究、教学单位的参考书。

该书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共25万字，每本售价6元。订购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孙文兰，电话5135087，邮政编码：100732。（朱）